



深陷“剧场效应”：高校招生为何越来越“卷”？

■ 正方

生源争夺战只是表象

■ 包万平

每逢高考结束，招生都会成为各高校的头等大事。为了抢到好生源，各校会想尽一切办法，以在残酷的竞争中获胜。这种生源争夺战最早从国内顶尖高校开始，最著名的就是“清北状元之争”，此后逐步延伸到各类型、各层级的大学。

面对纷纷扰扰的大学招生录取新闻，我们不禁要问，大学可以不进行生源争夺吗？

录取分数具有联动效应

答案是否定的。

原因很简单——每年大学招生的基本依据是高考成绩。按照公众的普遍逻辑，大学录取的分数、位次与大学办学水平、社会影响力等成正比，招生分数、位次越高，意味着办学水平越高；若大学招生分数和位次下滑，则意味着该校的办学实力或社会影响力同步下滑，且这种趋势具有联动效应，会对大学产生诸多不可预知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所有大学都很重视招生录取工作。

这其中，高水平大学由于各方面条件保障比较到位，招生宣传与咨询工作已下沉至各省份的县级中学，能“沉浸式”完成对高分考生点对点的志愿填报、录取、入校保障等服务工作，因此很容易在生源争夺中胜出。

相反，那些不知名的大学由于各方面条件相对有限，很难全方位、立体化地进行招生服务工作，加之大学本身社会影响力、地理位置等所限，很多高考生除非迫不得已，一般不愿报考。即便报考，也倾向于具有相对就业优势的专业，其他专业则不愿意考虑。

随之，这些非知名高校会出现部分专业学生招不满、无人报考的情况，这就会对后续的经费划拨、教师配比等产生一系列影响。若照此逻辑发展下去，就会出现知名高校越来越好、非知名高校越来越差甚至关门的现象。

“学生消费者”观点加剧生源争夺

这种大学生源争夺战是好事还是坏事？不同人有不同的思考。有人认为这对大学来说是一种负担和恶性竞争，费时费力，浪费资源，应该予以制止。但在笔者看来，这是中国大学具有竞争意识，并走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积极信号，值得肯定并给予鼓励。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以公办高校为主，政府作为高校的组织和领导者，承担着对高校发展

■ 反方

“设摊”招生：被出卖的教育尊严

■ 樊秀娣

对于高校为争抢高考高分生源而每年到全国各地“设摊”招生的做法，高校领域的意见基本一致——此事得不偿失，应该立即叫停。然而令人费解的是，高校每年派出人员的规模以及深入“要塞”的程度仍有增无减。

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招生工作本该大显身手的当下，高校为何如此执着于这种逆科技、高耗能、差效果的做法？这类高校招生问题值得一探究竟。

“设摊”招生弊处多多

纵观高校“设摊”招生中的不良行为及后果，将其称为“堕落”并不为过。

首先，打乱教育秩序。高考招生季正是师生最忙碌的期末阶段，此时，派出大量教职员（包括研究生）势必打乱正常工作节奏，甚至使得毕业班师生要拍张“全家福”毕业照都凑不齐人。同时，外出招生的人员有时一天也见不到几个咨询者，一样无聊或烦躁。

其次，挥霍教育经费。高校这样派人四处“设摊”，开销巨大不言而喻。更可悲的是，高校到指定地点“设摊”招生，有时还要向当地中介机构交纳“摊位费”，这些钱都是国家的。

最后，出卖教育尊严。一些高校招生人员为了吸引高分考生，往往明里暗里抬高己校，贬低他校，甚至私下“拆台”。有的高校招生人员向高分考生许诺不合理奖励，导致高分考生攀比各高校的“出资”金额。这种刻意迎合或讨好高分考生及家长的行为并非出于对人才的喜爱，而仅仅出于对“分数”的依赖。

总之，高校为招高分考生而不惜使国家和人民利益受损，与教育工作目的背道而驰。

高校“折腰”也有隐情

在全社会对高校高考招生录取分数过于敏感的大背景下，将“板子”全都打在高校身上也并不合适。事实上，高校并非不知道派人“设摊”招生已无实质性效果，也明白考分相差若干的考生，其学力并无实质性差异，但它们只得这样做。

其一，上级管理部门看重指标数据，高校及其专业的招生录取分数往往会影响到上级部门对高校及其专业的看法，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进行整体设想、安排的任务，并十分注重对高校财政、人事、招生计划等事项的管理。

在这种体制保障下，我国大学有了飞速发展，且后发优势凸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这种体制的弊端也非常明显——大学的很多事情都依赖政府，而且行政化现象比较明显，缺乏明显的市场竞争意识，以及视学生为核心的办学理念。

从大学发展角度看，学生既是教育对象，也是大学的核心组成要素。生源质量是决定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也是大学提高办学质量的保证，学生的创造性、主动性、积极性直接影响大学的办学质量和发展方向。因此，在实际运转中，学生的水平和层次就显得格外重要。

正是基于此，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以学生为中心”“培育质量文化”等成为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先进方向，各大学奉行以学生为本的理念，把学生作为大学发展的根本。

上世纪七十年代，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学生消费者”概念，大学以满足学生需求为前提，学生是高等教育服务市场的消费者。换言之，在高等教育的价值选择中，促进学生成长成为了大学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另外，作为大学教育经济成本分担的重要主体，学生将接受大学教育视为实现个人发展的重要投资方式，好大学在个人实现社会地位提升、经济回报增加、个人充分发展等方面的价值增值更为明显。因此，大学的办学质量以及提供的教育与服务是广大学生选择大学的重要依据。

此时，学生就是大学名副其实的“顾客”，是大学教育服务的消费者，他们要求大学更好地满足其发展要求。这种“消费者”的身份特点决定了学生对大学教育享有更充分的选择权。而大学能否根据学生特点，以更高的办学质量、更优质的服务满足学生的多元需求，成为了学生选择大学的重要考量因素。

在这一点上，不难发现很多世界著名大学在生源争夺上是毫不含糊的。在它们看来，学生质量是大学存在和发展的生命线，没有一流的生源，就难以办成一流大学。因此，西方世界的著名大学骨子里都有很强的竞争意识，以及视学生为顾客为的办学思想。它们非常重视招生工作，当然也更加关注学生的培养及后续发展。

生源争夺战应多方应对

当前，我国已进入世界公认的高等教育普

及化阶段。此时，考生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再是能否上大学的问题，而是能否上好大学的问题。

很显然，由于师资力量、经费支持、教学资源 and 设施等因素的制约，地方一般本科院校、民办高校、高职院校等的办学质量并未达到考生预期。今年就有媒体报道某些地方本科高校招生中出现了考生志愿零投档，再次征集志愿依然零投档现象，可见学生对大学的选择和要求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也给大学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

面向未来，在少子化背景下，生源危机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各层次教育机构之上。可以预见，我国大学生源会逐步减少，各类型、各层次大学间的生源竞争也会更加残酷。这就要求我们在新形势下，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

一是强化政策引导，优化高等教育经费分配机制，推进各类型、各层级高水平大学建设，特别是在政策、制度、经费上大力支持一般本科院校、民办高校、高职院校建设相应的高水平大学，从而扩大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供给总量。

二是明确各类型大学的发展定位，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大学之间的竞争，生源是表象，根源在质量。为此，不管何种类型的大学，都需要以学生为本，深化综合改革，健全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全面提高办学质量。

三是提高大学在学生发展中的领导力和显力度。大学不但要参与生源争夺，还要积极与中学保持更紧密的联系，将大学改革与发展的有效信息及时传递给中学，减少彼此间的信息差，从而避免社会上某些高考志愿填报辅导机构等对学生的误导，以及对大学办学产生的干扰。

四是做好“适合自己的教育才是最好的”理念宣传与教育。由于每个学生的性格特质、兴趣志向等差异较大，为实现事尽其功、人尽其才、各尽其长，大学要通过多样化的招生宣传与服务工作，与考生间形成最佳匹配和组合，而非一味让全民冲刺“重点”和“名校”。

五是加大专业调整力度，完善人才培养模式。高校要按照市场需求原则，优化与新发格局相适应的专业结构，加大专业调整力度，适时增设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社会急需和紧缺的专业、撤销就业率低、布局过剩的专业。进一步在大类招生、宽口径培养的基础上，推进跨学科、重交叉的复合型人才培养。

（作者系青海师范大学青海省人民政府－北京师范大学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 现状

高招生源竞争…学生「买方市场」下的「分分必较」

■ 王强

近年来，国内高校在高考招生录取时对于优秀生源的竞争加剧，并逐步转变为不同省份的排名竞赛。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源，部分高校甚至形成了全体动员、全员参与、全细节推进、全过程竞赛的生源竞争态势。

竞争从“清北”到“双一流”

历史上，国内早期的高校生源竞争主要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之间的“状元”之争。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部分香港院校也曾加入内地高考状元的竞争，成为“搅局者”。然而，近年来对于各省份高考生源的竞争已逐步成为“清北”扩大到“双一流”头部院校。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第二方阵之争”，即除“清北”外的第三名争夺。也就是说，谁是中国“第三高校”？这已经从教学、科研等传统指标竞赛转变为高校排位竞赛。

另一方面则是“第三方阵之争”。填报高考志愿时，位于中上游的原“985 工程”高校之间的竞争最激烈。这是一个相对缺乏安全感的“赛道”，绝大多数院校缺乏“清北”的绝对实力，但如果能成为第三方阵排头兵，则可以晋级中国大学前十，成为精英院校的代表。

此类高校主要包含几大类院校。一类是位于“北上广深”等区位优势明显地区的院校，比如某校深圳分校的招生分数已超过母校。另一类是传统的“地方豪强”，典型的是武汉、天津、长沙等地区高校，它们也深度卷入了此轮分省份竞赛。

此外，还有一类是“旧贵族”，即曾经拥有“C9”光环加持的高校。近年来，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在各类新大学生批次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的高校，也开始加入大学分省份进行的招生竞赛活动中。

除上述院校外，其他“双一流”院校也成为生源竞争的主力军，竞争激烈程度随着大学的声望和地位而有所下降，但也强于此前若干年。

高校的“买方市场”地位被打破

在过往学生需要估分填报志愿的阶段，高校与学生间的博弈存在很大的信息不对称性。即便在出分后填报志愿的阶段，由于缺乏大数据参照，两者的信息同样存在一定的不对称性。这些信息盲区致使学生的高考志愿填报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然而，随着平行志愿的全面推行，以及连续多年大数据库的积累与开放使用，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日渐透明化，高校的买方市场地位被打破，高校与学生双向选择、动态博弈的格局形成，因此带来极为惨烈的生源竞争。

至于具体的竞争态势，可分为以下几方面。首先是生源信息的竞争。顶尖高校往往尝试建立自己的中学“情报网”，在提前获得高考分数、提早锁定目标生源等环节展开竞争。这些竞争过程往往非常保密，“不可向外人道也”。

有些招生参与人员直言，部分高校可提前从有关渠道获得高分生源名单，并提早有针对性地锁定招生对象。除高考分数外，一些高校持有部分奥赛获奖学生名单、日常摸底考试优秀学生生名单等，以便精准开展招生工作。

其次是生源质量的竞争。一些生源质量高的中学往往成为重点高校的关照对象。高校采取各种方法努力建立与这些中学的联系，以获得生源选择权或中学推荐权。

这其中一些是官方合作关系，如大学在中学建立生源基地、建立科普实验基地，或选派知名学者进入中学演讲、向中学捐赠教育器材等。此外，还有一些“民间合作”，即大学招生人员与中学校长、年级组长，乃至对学生志愿填报有影响力的班主任、任课教师建立私人联系。一些私人联系甚至包括指导中学人员参与研究活动、为中学人员提供培训进修或者学历教育咨询等。

最后是高分生源的竞争，即一些高校每年都制定清晰的招生目标任务，力争提高各省份的最低录取分数排名，并形成工作计划与工作任务。

一些高校推行招生责任制，动员全院系和机关参与招生工作。学校招办坐镇总后方，各院系奔赴全国各地的招生工作“前线”。在招生过程中，“前线”和后方指挥部门密切联动。

在高考出分前，人员在各省份已经到位，密集开展招生宣讲活动，密切开展与中学各级领导和任课教师的沟通。招生组成员除专任教师和行政人员外，还有所在招生地区往年录取的本科生。在赴各省份招生前，招生组要经过多轮次严格培训，掌握校情和各类数据，甚至培训“话术”。

比如，有招生工作人员表示，学校会开展若干次招生培训，对于学校历史、学校关键数据指标、学校招生分数段等进行详细培训，并发放招生手册方便工作人员随时查阅。特别是要重点培训招生人员的咨询回复，因为招生关系学生的前途，回答问题不能有错误，尤其不能随便承诺。

最激烈的竞争体现在具体的招生过程中。在招生过程中，同等级院校往往通过承诺招生专业选择权、签订预录取协议等方式竞争生源。但这些目标生源同时会参加对手院校的宣讲活动，从而导致竞争加码。

比如，一些院校额外提供 4 年奖学金，另一些院校则承诺除专业选择权外，可将学生纳入至荣誉学院或学科基地等。这事实上已形成学生的“买方市场”，优等生高考志愿填报几无风险，只需要在几所目标院校中待价而沽、不断抬高价码即可。

在这一竞争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很多博弈问题，其中当然有部分院校的不诚信问题（如有的院校签订的预录取协议最后无法完成录取），但更多则来自学生的不诚信。有的学生经常改变主意，即使拍照发送给招生官员说明已经填报，也有可能在最后时刻更改其最终选择。

对此，有招生人员抱怨，很多学生游走于多个同层次院校间，在大学位次、专业选择与升学晋升等方面犹豫不决。一些学生担心招生人员的承诺无法兑现，一些招生工作人员则指责其他高校招生人员诋毁己校、恶意竞争。

“中学校长比大学校长都牛”

必须承认，当前的高校分省份生源竞争有其优点。比如促进了信息流通，学生可在入学前对目标高校有更深入的了解，也可充分利用分数获得良好的结果，避免滑档等传统志愿填报可能出现的问题等，但其不足之处也很明显。

首先，一些高校每年多轮次全员参与招生工作，经费成本和时间成本很高，一些专业教师每年要花费 15 到 20 天参与招生工作。特别是一些西部地区或东北地区院校，为获得优质生源还会额外设立奖学金等，也增加了办学成本。

其次，激烈的分省份竞争强化了中学的应试教育，导致其将注意力放在指导学生提升每一分、每一次排名上，并利用高校园间的竞争将分数用到极致，这与素质教育的方向并不统一。

再次，可能存在一些寻租或灰色地带。当前的招生状况强化了中学的话语权，一些招生人员经常抱怨“中学校长比大学校长都牛”，本质是中学部分垄断了学生的信息渠道，而学生能获得哪些高校信息、能获得哪些推荐信息，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生的志愿选择。因此，能否给予各高校公平竞争权、能否客观地向中学生推荐志愿填报信息非常重要。

最后，一些高校虽然近年来生源排名大幅提升，但不同省份间的生源基础却存在较大差异，导致一些弱势地区生源入校后出现学习困难问题的比例在加大，从而带来后续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问题。一些高校招生时承诺的条款未落实到位，也可能带来一些矛盾和纠纷。

（作者为国内某高校教育学院研究人员，应本人要求，其署名为化名）